

身份、认识与价值的三重自觉: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机理研究

薛 刚¹,张敦力²

(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是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基础。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党的自我革命独特性为理论基点,立足中国特有的政党治理逻辑,尝试建构一个解释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机理的分析框架。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从身份自觉、认识自觉与价值自觉三重维度揭示党的自我革命的独特性根植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与使命任务共同塑造的主体性结构,阐明国家审计回应三重自觉的内在逻辑:通过权力约束服务身份自觉,将“权为民所用”转化为程序性监督;通过研究型审计服务认识自觉,为党把握执政规律提供循证支撑;通过信息穿透与监督问责保障价值自觉,确保改革意志坚定落实,三者共同构成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完整逻辑,据此提出深化权力全过程监督、拓展研究型审计深度、强化信息穿透与督促整改落实等实践路径。

[关键词]国家审计;自我革命;主体性;身份自觉;认识自觉;价值自觉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6)05-0032-07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宪法确立的审计监督制度基础上,持续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将其摆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将审计监督纳入党内监督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强化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提出“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1]。这个演进历程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审计工作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国家审计在党的自我革命中何以以及如何发挥其独特作用,构成了一个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

既有研究从三个层面阐释了国家审计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功能:第一,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塑造了国家审计的政治属性。学者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思想赋予国家审计新的政治属性^[2],使其超越传统经济监督范畴,必须将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置于首位^[3]。由此,审计成为兼具显性经济监督与隐性政治监督功能的复合体^[4],为其深度融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实践奠定了根本前提。第二,从经济贯通政治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审计是监督、整改、问责、研究等多维效能的有机统一^[5],以专业技术手段揭示经济问题背后的权力滥用、制度失效等政治性根源问题^[6]。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靶向发力,整治腐败,从而直接服务于党的自我净化与革新^[7]。第三,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基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审计在党的自我革命中找准定位、保持战略定力、敢于动真碰硬的根本政治保证^[8]。上述研究主要固于国家治理的技术效能框架,从审计业务层面探讨其工具性价值,未能跃升至党的建设的政治高度。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从身份自觉、认识自觉与价值自觉三重维度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独特性根植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与使命任务共同塑造的主体性结构,阐明国家审计回应三重自觉实践需求的内在机理:通过权力约束服务身份自觉,将“权为民所用”转化为程序性监督;通过研究型审计和政策审计服务认识自觉,为党把握执政规律提供循证支撑;通过信息穿透与监督问责保障价值自觉,确保改革意志坚定落

[收稿日期]2025-11-16

[基金项目]财政部“全国会计名家”培养工程

[作者简介]薛刚(1979—),男,湖北宜昌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从事审计理论研究;张敦力(1971—),男,安徽庐江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公司财务研究,通信作者,E-mail:dunlit@163.com

实,三重机制共同构成国家审计推动自我革命的完整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提出深化权力全过程监督、拓展研究型审计深度、强化信息穿透与督促整改落实等实践路径,以期在理论上清晰地呈现国家审计对党的自我革命的独特作用路径,在实践中准确抓住国家审计服务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点,也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支撑。

二、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根基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独特性根植于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由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与使命任务共同构成党在身份、价值与认识三个层面的主体性自觉。

首先,党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的身份根基。阶级属性集中体现了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质的规定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忠实地代表和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无特殊利益”的本质属性使党对自身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不是“部分”对“整体”的代理关系,而是“整体”对“自身”的自我审视。这种审视不是指向外部利益集团的调整,而是指向自身是否始终与人民立场保持一致。由此,党形成了对自身本质规定的身份自觉——它不是外在于党的政治要求,而是党在长期执政中对“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的持续回答。

其次,党的理论发展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党认识世界的科学工具,还是党改造主观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9]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时刻将其与客观实践进行比较。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0]。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实践品格驱动党形成了认识自觉——党主动在实践中把握对治党治国的规律性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

最后,党的使命任务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指向。使命型政党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以完成特定历史使命为根本存在方式的政党类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其要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党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自身建设得坚强有力,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等风险挑战。使命的崇高性与艰巨性促使党形成价值自觉——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内化为实践指引并持续校准自身行为的自觉。

这三个层面主体性自觉的形成,源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根本差异。西方政党政治以政权更替形式掩盖其政权的阶级本质,中国的政党制度则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对各项重大决策进行顶层设计并统筹实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必然是方向向内的主客体统一——党既是革命的主体,又是革命的客体,不存在一个外在于党的力量来替代党完成对自身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代表人民利益的身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认识自觉、完成使命担当的价值自觉,共同构成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主动性。这种内在主动性使党的自我革命区别于任何被动性的“纠错”:它不是在外压下的应激反应,而是源自政党本质的内生动力。身份自觉赋予党敢于革命的勇气,认识自觉赋予党善于革命的方法,价值自觉赋予党必须革命的方向。正是这种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内在自觉,使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治理的根本动力——它不是党“选择”的一种政治姿态,而是党的性质、使命与指导思想共同规定的由内而外的必然,这三重自觉共同构成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性结构。

三、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性内涵

身份、认识与价值的三重自觉共同构成了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性结构。这一结构有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与当代发展。自我革命以党的自身问题为革命对象,其内涵不仅体现为一种精神品格,还展现为一种解决党内突出问题、推进党的建设的实践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守正创新:既澄清了将“革命”与“执政”截然分开的认识误区,保持了革命者的斗争精神^[11],又将革命客体从外部转向自身,把自身存在的问题确立为革命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对“自我革命”

的深刻内涵进行逐级展开。这四个以“自我”为前缀的概念凸显了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性,表明自我革命的主体是党组织和党员自身,要求全党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将自我革命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动,依靠党的自身力量主动清除自身肌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12]。自我革命首先要解决的是革命的驱动力问题,只有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主体性,才能确保党能够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主体性意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性的发挥不仅表现为主动认识、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表现为在实践中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自身,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中国共产党作为自我革命的主体,其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身,对自身局限性进行主动的、彻底的批判性反思和实践性超越。在这个过程中,党展现身份自觉、认识自觉和价值自觉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一) 先进阶级的身份自觉

身份自觉体现为党对自身存在本质的主动反思和深刻认同,是党发挥主体能动性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13]。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自觉肩负起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确立起自身在改造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身份自觉决定了党在自我革命中必须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任何背离人民利益的行为都是对自身本质的否定。身份自觉的深化,要求党不断检验自身的执政实践是否真正落实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否真正保持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这必然要求权力行使的人民性——“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14]。党必须始终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将权力运用于增进人民福祉的实践中,才能正确体现党对自身身份的主体性确认。

(二) 历史规律的认识自觉

认识自觉体现为党对认识、运用、发展规律的主动意识和自觉行为。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体要将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从而在对客体的实践中获得并验证真理;任何规律和真理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和发展,这要求党不断深化对规律的把握,发挥自身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将自身行为建立在对规律认识的必然性之上。党作为认识主体,需要在与客体的辩证互动中主动担当,不满足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更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循环中,始终保持党的理论优势,始终正确指引实践方向。具体而言,要善于从实践工作中总结提炼规律,并根据新的实践条件不断调整优化,从而将规律认识转化为推进革命的实践力量,这体现了党对认识真理的主体性确认。

(三) 理想目标的价值自觉

价值自觉是主体从自身存在意义的角度进行反思和再造,要求主体将自己的价值立场作为自身行为标准和实践指引,通过主动的自我反思和扬弃,将内在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外化为实际行动,在自我超越中实现价值升华。价值自觉的实质是党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内化为实践指引,并在行动中不断校准自身行为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在自我革命的价值维度中,党要时刻审视自身行为的价值符合性,主动批判党内存在的背离初心、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等问题;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自身使命,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体现价值对实践的引领与规范作用。

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性“身份自觉、认识自觉、价值自觉”从本质上规定了党必须将自我革命的精神自觉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可问责的制度化实践。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将党的执政实践转化为客观、可验证、可评价的反馈机制,国家审计的制度功能正好回应了这一需求。

四、国家审计服务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系统回答的“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三个重大命题,将党置于一种持续的主体性追问之中——对自身本质、实践能力和理想目标的追问。这三重追问正是身份自觉、认识自觉与价值自觉的对应展开,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主体性,构成了党在精神层面形成持续革命动力的内在依据。国家审计作为党“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制度化反馈机制,回应了这一依据的实

践需求——通过权力约束为身份自觉提供程序性检验,通过研究型审计为认识自觉提供实证支撑,通过信息穿透与监督问责为价值自觉提供落地保障,帮助党将精神自觉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制度化实践。

(一) 权力约束:服务身份自觉的审计路径

身份自觉的核心是党对自身本质规定的持续追问——权力来自何处?为谁服务?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人民代表,对自身权力来源与行使方向的清醒认知是其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前提。这一认知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本质规定性。国家审计通过资金流向还原权力运行过程^[15],以程序性制约帮助党将“权为民所用”的理念转化为可监督、可检验、可问责的治理实践,使对自身本质的追问获得客观的、可验证的回应渠道。

以资金监控为切入点,还原权力运行的关键节点。程序是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也是规范运行的基本保障。在制度规范的权力运行体系中,资金的流动必然受到程序性制约,每一个审批、拨付、使用节点都是用权的关键节点。国家审计以资金真实性、合法性为监督主线,回溯资金的审批轨迹,还原资金流背后的权力运行过程。对于问题资金的追溯,能够准确定位权力制约失灵的具体节点——是决策节点缺乏民主,还是执行节点滥用裁量,抑或监督节点形同虚设。由此,国家审计有效识别权力运行的关键控制点,推动完善从决策到执行各节点的程序规范,强化对人、财、物等关键权力的程序性制约,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全过程监督^[16]。这样,将“权力是否用于人民”这一抽象命题具象化为从资金流回溯到权力失效节点的识别过程。正是这种“以事察权”的机制,使身份自觉建立在制度运行的事实基础上,党由此得以客观地确认自身权力运行是否符合“权为民所用”的本质规定。

作风问题侵蚀党的形象与公信力,腐败多由不正之风量变积累而成。国家审计立足经济监督,聚焦超标准开支、异常支出、巧立名目等资金异常,揭示“四风”的具体表现;深挖违规背后的利益链条,斩断由风及腐的传导路径。审计以客观证据揭示背离党的宗旨的行为,帮助党确认执政实践是否真正坚守人民立场,在整饬作风、惩治腐败中实现“破四风、立身份”的身份自觉。以某省国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为例,审计发现企业低价处置国有资产、少收处置收益等问题。经资金流回溯,审计精准定位权力制约失效节点——“三重一大”集体决策未履行、大额资金支付无审批程序、部分固定资产未纳入资产管理。审计报告不仅揭示违规事实,而且指出国企领导在权力行使中背离了“国有资产守护者”职责。审计意见反馈后,国资、商务、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等主管部门出台20余项管理办法,强化资产处置的程序性约束。该案例表明,审计通过资金流回溯精准定位权力失效节点,推动制度完善,使“权为民所用”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实践。

(二) 规律把握:推动认识自觉的审计机制

认识自觉的核心是党对自身实践能力的追问: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决策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党保持先进性的认识论前提。党要确认自身是否真正做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仅凭经验感知,而必须借助系统性的实证支撑。国家审计凭借其接触海量一手数据的制度优势和专业分析技术,通过研究型审计将分散于不同地区、行业的政策执行效果进行整合分析,将“做了什么”与“做得如何”转化为可验证的审计结论,使对自身实践能力的审视获得可靠的实证依据,助力党实现从“做了什么”到“做得怎样”“为何如此”的认知跃升。

国家审计通过信息调查优势,为党把握规律提供实证基础。审计机关具有依法获取真实数据的制度优势,能够将分散于不同地区、行业的财政财务收支、项目进度等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影响政策效果发挥的影响因素,为政策校准提供经验依据。这种从具体案例到一般结论的认知升华,正是党深化执政规律认识的关键路径。进一步地,国家审计通过共性判断,将规律性认识转化为治理智慧。研究型审计通过对普遍性问题层层剖析,厘清体制机制障碍的本质,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推动制度修订与完善,使党在螺旋上升的实践中加深对执政规律的理解。

认识自觉还体现为在运用规律中不断调整优化政策,使政策与实践相符。制度制定需考虑与地区情境的耦合以及执行的灵活性。审计机关常年积累政策效果数据,能够对政策的适用条件、整体效果进行系统评价,促使党关注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是否满足了社会需求,为党优化政策设计提供决策支持,在这一循环中,国家审计助力党从被动执行走向主动优化,使认识自觉真正成为驱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力量。

在上述经济责任审计案例中,审计还发现企业境外投资发生重大损失,大额资金无法收回。经追溯,项目投资未进行风险评估、论证不充分、未经集体决策。审计报告在全面揭示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企业境外业务管控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出完善境外投资风险防控的建议,形成专报上报省委省政府。省政府高度重视,出台省级

层面相关管理办法。该案例表明,审计通过分析驱动认识自觉,推动政策完善,使“科学决策”转化为可遵循的制度规范。

(三)价值校准:保障价值自觉的审计逻辑

价值自觉的核心是党对自身理想目标的追问:党的执政实践是否真正朝着社会革命的目标迈进?是否存在偏离理想方向的行为?回答这些问题,决定了自我革命的最终成效。价值自觉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最高层次,要求党在自我超越中引领社会革命。这意味着党不仅要清除自身肌体的“毒素”,还要主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在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事关全局的重要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国家审计通过信息穿透破除科层信息壁垒,将基层执行的真实情况及时反馈至决策层;通过监督问责对改革中的敷衍塞责、抵触变通形成硬性约束,使党对自身理想目标的价值追求获得可检验的实践尺度。

国家审计实现价值自觉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对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全过程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要“坚决冲破不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各方面体制机制障碍”^[17]。党领导社会革命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是科层治理中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政策执行偏差。下级单位可能会通过信息过滤规避上级监督^[18],导致改革意志在层层传导中被消解、扭曲。国家审计通过两大机制回应这一挑战:一是信息穿透机制。凭借独立性与专业性,将基层虚报、滞后的信息还原为真实、及时的审计信息,解决科层治理中委托代理模式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困局^[19],为党通过行动性治理^[20]纠正政策偏差、调整体制机制提供直达通道。二是监督问责机制。通过强化整改与问责,对改革中的敷衍塞责、抵触变通行为形成硬性约束。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在此环节有机贯通^[21]:国家审计从经济监督切入,旨在揭示问题、防范风险、促进治理;纪检监察监督公职人员的履职用权情况,两者在对象和内容方面互补,形成“经济体检”与“政治监督”的有机统一^[22]。在权力运行上构建线索移送、措施配合、成果共用的衔接机制,确保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治意图的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和问责。通过上述机制的协同发力,国家审计帮助党确认社会革命实践是否真正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清除体制机制障碍。这种“价值校准”功能使审计以客观证据检验党的执政是否走在通向最高理想的正确道路上,从而在自我超越中实现价值自觉。

以简政放权改革跟踪审计为例。审计发现,部分行政审批机关以取消“含权量”低的审批事项、变换审批形式等方式,变相保留核心审批权,导致改革“明放暗不放”。审计机关通过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穿透地方上报的“放权清单”,比对实际审批流程与企业反馈,精准识别信息过滤与执行变通。通过审计报告直接点名问题地区,督促相关地方取消违规保留事项,将地方行为置于上级与公众的双重监督下,确保改革意图的有效贯彻^[23]。该案例表明,审计通过信息穿透破除科层信息壁垒,保障改革意志从中央到基层的切实贯彻。

综上所述,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沿着三重自觉层层递进:以资金监控与风腐同查服务身份自觉,将“权力来自人民”转化为程序性约束;以研究型审计与政策调适服务认识自觉,推动从被动执行到主动优化的认知升华;以信息穿透与监督问责保障价值自觉,确保改革意志坚定落实。三重逻辑共同增强了党自我革命的主体性,使党能够在持续扬弃中保持对自身的反思和超越,确保党在自我革命中展现出更高维度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五、发挥国家审计独特作用的实践路径

在系统阐释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本文从操作层面提出实践路径,以期为审计机关深化权力监督、拓展研究型审计、强化信息穿透提供制度建议,实现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性功能不断升华。

(一)深化权力监督,筑牢身份自觉的制度防线

身份自觉的核心是确保权力始终来自人民、用于人民。为此,国家审计应进一步强化对公共权力配置、行使与问责的全链条监督。

一是完善资金流追溯与程序性制约机制。审计应聚焦预算审批、资金拨付、项目验收等关键节点,通过常态化经济责任审计和专项审计,精准识别权力制约失效环节,推动修订完善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程序规范。对于审计发现的权力滥用、违规决策等问题,要建立整改清单,并纳入干部考核与任免参考体系,使“权为民所用”从原则要求转化为可追溯、可问责的制度实践。二是健全风腐同查同治的审计监督模式。审计要立足经济

监督优势,深入核查超标准开支、异常列支、虚列项目等资金异常行为,深挖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线索。同时,建立审计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的信息共享与线索移送机制,对由风及腐、风腐交织等问题进行一体查处、同步整改。通过定期发布“四风”典型审计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推动形成“破四风、立身份”的自觉氛围,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二)拓展研究型审计,提升认识自觉的决策支撑

认识自觉要求党在把握规律中优化政策,在优化政策中深化认识。审计应进一步发挥其数据优势和专业分析评价能力,成为政策评价与制度创新的知识引擎。

一是构建政策效果数据库与循证评价体系。审计机关应整合财政、金融、民生、资源环境等领域数据^[24],建立统一规范的政策效果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 with 案例研究,识别影响政策效果的关键变量,为党中央提前识别潜在风险、破除发展体制障碍、找准改革突破方位提供可靠的“循证”支撑。二是提升政策审计对政策的评价功能。当前要继续聚焦政策执行跟踪审计,通过揭示执行中的偏差与梗阻,推动执行机制与制度改进,确保公共政策全面落地,从而确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为民导向。在此基础上开展特定政策效果评估,综合研判政策目标的合理性、成本效益、实施效果及损害补偿,对政策整体效能发表审计意见,通过专业意见融入政策存续或调整,最终发挥审计的风险识别与智库功能,前瞻研判社会危机,及时为政策制定与完善提供建议。

(三)强化信息穿透,保障价值自觉的行动治理

价值自觉要求党的社会革命意志能够坚决落地,不折不扣执行。国家审计应进一步强化信息穿透能力和监督问责威慑,保障审计信息从基层到中央的真实、及时,改革政策从中央到基层的畅通传导。

一是构建从基层到中央的信息穿透机制。对重大改革政策与重点项目资金实施跟踪审计和穿透式审计,沿着资金流与业务流双向核查,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变通、过滤、截留等问题。运用大数据审计技术,将业务、财务、行业数据与政策要求及区域情境进行比对分析,对异常资金流向、项目停滞等风险信号自动识别并快速上报,确保基层真实情况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至党中央,为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二是发挥审计整改的制度完善功能,确保改革政策从中央到基层的畅通传导。对于审计查出的体制梗阻、治理漏洞及风险隐患,应强化整改效能,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治理机制,筑牢安全防线,打通政策传导中的层级阻滞与利益壁垒。特别是对于触及利益固化藩篱的改革难题,国家审计必须把整改置于与揭示问题同等重要的位置,严肃查处阻碍改革、敷衍塞责、执行不力的行为,坚决问责以维护审计权威^[6],保障中央改革意志自上而下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权力约束、规律把握与价值校准是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主体性的三条实践路径。唯有持续完善审计制度、创新审计方式、强化审计权威,才能使国家审计真正成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可靠依托,使党始终以高度自觉的主体状态永不停滞地推进自我革命。

六、结语

本文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党的自我革命独特性为理论基点,系统探讨了国家审计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从身份自觉、认识自觉与价值自觉三重维度揭示党的自我革命的独特性根植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与使命任务共同塑造的主体性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阐明了国家审计回应三重自觉实践需求的内在逻辑。国家审计通过权力约束机制将“权为民所用”转化为可检验的程序性监督,服务身份自觉的实现;通过研究型审计将政策执行效果转化为可验证的实证结论,服务认识自觉的深化;通过信息穿透与监督问责将改革意志转化为可追溯的落地保障,保障价值自觉的践行。三重机制层层递进,共同构成国家审计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完整逻辑。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其一,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独特性”的学理依据——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纠错,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基于自身性质、思想与使命的内在必然;其二,构建了“身份自觉—认识自觉—价值自觉”的三重主体性分析框架,为国家审计回应党的自我革命需求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其三,揭示了国家审计从“经济监督”到“革命赋能”的功能转化机理——它不是外在于党的监督力量,而是党“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制度化反馈机制;其四,从中国特有的政党治理逻辑中提炼出解释概念,是对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次有益探索^[25]。

国家审计在自我革命中的作用,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哲学。本文分

析表明,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党理论为根基,从中国审计实践中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唯有持续深化研究型审计、强化权力运行全过程监督、强化信息穿透与督促整改落实,才能使国家审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党的自我革命的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21): 4-10.
- [2] 鲁清仿, 周超青. 国家审计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与路径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4(12): 188-195.
- [3] 秦荣生.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建构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J]. 审计研究, 2024(5): 17-25.
- [4] 王建芹, 周鹏龙. 审计监督赋能党的自我革命的理与路[J]. 理论与改革, 2025(2): 79-96.
- [5] 陈汉文, 张笛, 韩洪灵. 坚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独特作用[J]. 财会月刊, 2025(19): 9-13.
- [6] 张晓峰. 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审计发展的路径[J]. 审计研究, 2024(2): 3-8.
- [7] 陈俊达, 陈鸿英. 国家审计四十年: 在变与不变中守正创新[J]. 审计研究, 2023(6): 3-7.
- [8] 王永海. 论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J]. 审计研究, 2024(1): 11-17.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1] 赵付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科学体系的学理阐释[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9): 18-26.
- [12] 段妍. “自我革命”概念的历史溯源、创新发展与时代价值[J]. 教学与研究, 2026(3): 37-45.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M].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4] 习近平.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M].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6.
- [15] 崔雯雯, 张立民. 国家审计功能的拓展: 从监督处罚到风险防范——以政府债务常态化审计为视角的分析[J]. 会计研究, 2021(3): 180-192.
- [16] 冯素坤, 岳洪江.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国家审计功能的跃升: 从风险揭示到安全治理[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6(2): 23-33.
- [17] 习近平. 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18] 王善平, 谭雪. 国家审计治理地方政府行政代理问题的机制研究[J]. 会计研究, 2021(8): 153-160.
- [19] 王浦劬, 汤彬. 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9): 4-24.
- [20] 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一个组织学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 [21] 厉国威, 俞杨阳, 胡敏. 国家审计与国家监察协同治理路径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6(1): 11-20.
- [22] 胡智强, 魏华龙, 余冬梅. 当代中国审计监督权概念的引入与自主发展[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5(3): 10-18.
- [23] 郑伟宏, 廖林. 政府审计促进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效果研究[J]. 审计研究, 2021(5): 29-41.
- [24] 沈楚楚. 国家审计如何影响地方政府民生回应? ——兼论公众监督和信息化的调节作用[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5(3): 19-28.
- [25] 刘明辉, 韩小芳, 刘雅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的自主建构: 十五个核心命题及其理论阐释[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6(3): 12-26.

[责任编辑: 刘 茜]

The Triple 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Value: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National Audit Promoting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XUE Gang¹, ZHANG Dunli²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Leveraging the unique role of auditing in advancing the Party's self-reform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providing robust and effective audit oversight to support the overall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the Party's self-reform under China's new party system,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distinctive logic of party governance in China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ow state auditing drives self-reform. Starting from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a Marxist party, it reveals the uniqueness of self-reform rooted in the subjectivity shaped by the Party's nature, guiding principles, and mission, elucidat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state auditing in responding to this triad of self-awareness: serving identity self-awareness through power constraints by transforming "power for the people" into procedural oversight; serving cognitive self-awareness through research-oriented auditing to provide evidence-based support for the Party's grasp of governance laws; and safeguarding value self-awareness through information penetration and supervision accountability to ensure the firm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wills. These three dimensions collectively form the complete logic of state auditing in driving self-reform. Accordingly, practical pathway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deepening whole-process power oversight, expanding the depth of research-oriented auditing, and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penetration with supervision and rectification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audit; self-revolution; subjectivity; identity consciousness; cognitive consciousness; value consciousness